

论柴德赓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特点

侯德仁*

柴德赓（1908—1970），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浙江诸暨人。他是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的高足，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学院任教，在历史学研究和教育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柴德赓先生一生学习和研究历史，在历史研究上表现出了自身鲜明的治史方法和特点。

一 柴德赓的主要生平和著作

柴德赓，字青峰，1908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思安乡柴家村。5岁入私塾，11岁能读《古文观止》，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小学毕业后，开始研读《左传》《纲鉴易知录》《东莱博议》《古文辞类纂》，对文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3年，柴德赓进入临浦小学初中班，深受历史教师蔡东藩先生的影响和熏陶，研读文史知识的兴趣更加浓厚。1926年夏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文科。1929年柴德赓北上，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师从史学大师陈垣，从此师生之间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谊。柴德赓深得陈垣先生的器重，得陈垣先生治学精神之真传，为“陈门四翰林”之首。大学毕业后，柴德赓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并任北师大与江苏师院历史系系主任。他潜心研究史学四十年，成就斐然，造诣精深。又精于词章，兼擅书法。已故

* 侯德仁，苏州大学历史学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题辞赞其“育才治学，两有所长，专门治史，成绩昭彰”^①。瞿林东先生也在《史籍举要》的“重版前记”称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家，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②。这些评价皆非虚誉，因为，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人才培养上，柴先生确实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柴德赓先生毕生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是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读书和教书时，就备受陈垣先生的青睐。1930年6月，陈垣先生在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的讲稿上，就有“十九年六月廿五日试卷，师大史系一年生柴德赓、王兰荫、雷震、李焕绂四卷极佳”^③的批语，可见甫一入学的柴德赓就受到了陈垣先生的青睐。从此，柴德赓就在陈垣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史学研究，而且登堂入室，成为陈垣的入室弟子，得意高足，是其学术传人。柴德赓在四十年的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成果丰硕。他精通目录学、文献学和考据学，对宋史、明清之际的历史与清代学术史，都有精湛的研究，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因历史条件限制，在其生前仅在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尚未来得及将其所撰述的著作公开出版。柴德赓去世后，在其家属、学生的推动下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先后公开发表。迄今为止，柴德赓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史学丛考》《史籍举要》《清代学术史讲义》《资治通鉴介绍》等先后得以发表。这些著作的发表为学术界学习和研究柴德赓先生的史学成就和方法提供了绝佳的素材。

作为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柴德赓先生的学术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总结其史学研究的方法和特点，对于深入理解20世纪的中国史学成就和特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总括说来，柴德赓先生史学研究的方法和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精通目录学与文献学，善于考镜学术源流；精熟史学考据，考证方法缜密多样；熟谙史学比较方法，于比较中获得新见。

① 周谷城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题词》，载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卷首。

② 瞿林东 《登堂入室的门径——〈史籍举要〉重版前记》，载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③ 陈智超 《千古师生情》，载《民主》2008年第1期。

二 主张学术研究从目录学入手，开展寻流溯源的研究工作

读书治学应该从目录学入手，是古今很多学术名家的共识。乾嘉考据大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即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也曾指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由此可见，王鸣盛、张之洞都认为，谙熟目录学不仅是学人治学的敲门砖和必备素养，也是获得学术成功的必经之途。柴德赓先生深得历史文献学大家陈垣先生学术之真传，通晓目录学和文献学，对王鸣盛和张之洞的这个观点自然十分赞同，他对文献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柴德赓在谈到如何收集史料时，曾论及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功用。他说“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把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史料尽量收集起来，这是调查研究工作的最基本条件。”“可是史料太多，时间有限，每一个问题的史料，每一个的史料要全面理解是不可能的。如能对中国历史书籍的大概情况有一个概括的系统的了解，知道哪些史料散在哪些书中，则是掌握史料的初步工作，这个工作有赖于目录学这一类的知识。”“事实上，了解书籍目录源流，确能帮助解决许多问题，至少可少走许多弯路。至于深入细致的功夫，那是钻研不尽的。不懂目录学的人，也可以找到史料，但是不能有系统、有重点、有门径地去收集；收集了来，可能不很完全，甚至很重要的倒遗漏了。经验证明，脚踏实地去学习是最稳当、最有效的。”^①柴德赓的学生周国伟，因个人爱好而经常向柴德赓问学，因而多次获得柴德赓亲炙教诲，后来著成《二十四史评议》一书。他曾回忆说：“当我第一次见面和求教时，柴老师问明了我读过哪些历史古籍和大致了解我的历史知识水平后指出：要研究历史，必须从目录学入门。作为一个原来学经济而转入学历史者来说，更需如此。因即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张之洞《书目答问》给我，教我仔细阅读。又说要做学问，必须多读书，不可随便乱写文章。……而读书，必须详校，不校不读，边校边读。因要我首先校读前四史，教我以百衲本为底本校读光绪同文本，并从书架上抽出了

^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前言》，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页。

这些书给我。”^① 在这一段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就可以获得很丰富的信息。其一，柴德赓主张史学研究必须从目录学入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目录学入门的基础著作；其二，柴德赓主张读书要不同版本之间对照校读，边读边校，再从读书和校勘中发现问题，然而再去努力研究解决问题。其实柴德赓的这一主张，正是说明了柴德赓内心所服膺的乾嘉诸老的学术路径。乾嘉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即表达了与柴德赓非常相似的观点，他说“予识暗才懦，一切行能，举无克堪，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二纪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② 由此可见，王鸣盛与柴德赓都共同主张读书应该“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的主张，否则就会造成“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的问题。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柴德赓主张历史研究必须从目录学入门，而且还要熟练掌握校勘学、版本学等文献学知识，这是搞好历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

其实，柴德赓的学术研究领域也主要以文献学研究见长，他具有非常丰富的目录学和文献学知识，学术功力精湛。他对历史文献和史籍目录非常熟悉，征引古籍文献几乎可以信手拈来，这为他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教学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事实上，柴德赓先生在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中，时时处处都会熟练运用目录学知识。柴德赓所著《史籍举要》一书就是一部文献目录学研究专著，这是在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程手稿和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其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文献目录学知识，为有志史学研究入门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因而该书问世后备受好评，瞿林东先生赞誉此书是史学研究“登堂入室的门径”^③，吕叔湘则赞誉该书“脉络贯通”，评论“恰中肯綮”“在同类书中允称上选”，因而“有志于史学的人，手此一编，费力省而得益多，登堂入室，左右逢源，对于著者一定是感激不尽的”^④。比如他的《史籍举要》就是按照目录学体例来分类介

① 周国伟 《怀念柴老师》，载《青峰学记》，载《江苏文史资料第52辑》，第254页。

②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瞿林东 《登堂入室的门径——〈史籍举要〉重版前记》，载柴德赓《史籍举要》2002年版卷首。

④ 吕叔湘 《书柴德赓〈史籍举要〉》，载《光明日报》1990年5月2日。

绍历史典籍的，全书按照史书体裁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纪传体类，叙述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兼及十家《后汉书》、二十三家《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和《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著作；下编分为五类，包括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政書類、传记类、地理类，分别举要叙述多部重要相关著作史籍作为说明，帮助读者精要选择入门参考史籍。对于每一部史籍的叙述，《史籍举要》一般都按照：“（一）作者及著作时代；（二）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三）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四）注解及版本”的次序依次条分缕析地介绍，其中贯穿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目录学知识。其中纪传体类，《史籍举要》以介绍二十四史为主，按时间先后次序逐一加以介绍，这种安排，既对每部著作的内容、版本等情况有详细的阐述，又可以从整体上体现出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源流演变，这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的整体格局与微观细部的谙熟程度。至于其他体裁，例如纪事本末类史籍，《史籍举要》是这样论述的：首先介绍纪事本末体的起源，“纪事本末这一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出现是比较晚的。中国史学最早的是编年体。太史公出，创造了包括纪传表志的综合体例，南北朝以致唐宋，大致如是。至南宋始有纪事本末一体，以事件为主，不以年代、人物为主，史体遂备。纪事本末一体，自来皆称始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进而，柴德赓逐一介绍《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等史著的编纂始末和价值，进而引出“九朝纪事本末”的概念。他说“以上所讲五种纪事本末，加上《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杨陆蓉《三藩纪事本末》四卷，即为所通行的‘九朝纪事本末’。”最后，他进一步总结说“自宋以来，史体有以史事为主的一体，其形式不外乎纪事本末，亦步亦趋。自明至清，此体逐渐发展。……清代官书中，又有‘方略’一种，实亦纪事本末之类，如《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勒德洪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卷，温达等撰……。至近代，此体最为发展，以年月为次，以事之首尾为起讫。如《筹办夷务始末》《武昌革命真史》《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皆是。”^①就是在这些看似简单平实的叙述中，柴（德赓）不但介绍了各种纪事本末体的代表性史籍及其作者情况，而且还

^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7、208页。

将纪事本末体史书体裁的源流演变情况叙述得清清楚楚，线索明晰。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柴德赓先生对目录学和文献学十分娴熟。

不仅是目录学，柴先生还有着丰富的版本学知识。比如其介绍《后汉书》内容和体例时，一并介绍其版本流传情况时说“《后汉书》因纪传与志分属二人，各本排列次序，都是纪、传在前，志列于后，只有殿本把志插入纪、传当中，而殿本流传又最广，因此引用《后汉书》志、传的卷数，常常相差至少三十卷。《后汉书》有宋刘放校本，今附入注。……现存《后汉书》版本以百衲本所用的宋绍兴刊本为最早。这书的特点是保持了原来面目，比较可信。”^①就在这一小段文字中，不仅简明地罗列了《后汉书》的主要版本及其异同，而且还出现了很多版本学的专有名词，如百衲本、殿本、宋绍兴刊本、校本等古籍版本学概念术语，这又充分地显示出作者扎实的版本目录学功夫，令人钦佩。再如作者对《南齐书》版本流布情况的介绍说“今本《南齐书》只五十九卷，宋蜀大字本亦如此。遗失的一卷可能是序录。刘知几所见《南齐史》亦五十九卷。但《史通·序例》篇云‘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五举此条以为刘知几曾见序录之证，今序录已不存。《四库提要》误以序录为序传，不知序传当叙先世事迹，序录仅述作书义例，是不同的。说详余嘉锡氏《四库提要辩证》。萧子显作成《南齐书》时有进书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高似孙《史略》均引用，也许宋时此表尚附本书中。今百衲本为宋蜀大字本已无此表。此书各本缺州郡志上、列传第十六、二十五、三十九各一页。百衲本仅缺二十五、三十九各一页，较各本多二页。”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即可以获知有关《南齐书》版本流布的丰富信息：第一，萧子显《南齐书》今本只有五十九卷，但根据萧子显本传称《南齐书》六十卷，因而可能逸失一卷。《南齐书》逸失的一卷有可能为原书的《序录》；第二，《四库提要》错把序录当作序传，其实序传主要叙先世事迹，序录则叙作书义例；第三，根据《史通》所言，刘知几可能见过《南齐书·序录》，但不知为何刘知几所见的《南齐书》也是五十九卷；第四，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高似孙《史略》的征引，《南齐书》成书时有进书表，然而现今所传之百衲本和宋蜀大字本均无此表，还各有缺页；第五，短短一小段文字，柴德赓引征

^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7页。

了刘知几《史通》、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清官修《四库提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高似孙《史略》以及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等多部著作，论证萧子显《南齐书》的版本流传情况，还对今本、百衲本、宋蜀大字本等版本的《南齐书》进行了比较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再次确证柴德赓具有非常渊博的文献目录学知识，对史籍文献的版本流布情况相当精熟，拥有丰富的版本学知识。

章学诚曾指出，文献目录学研究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特点。确乎如此，柴德赓先生的文献目录学研究也常常体现出这一学术特点。就他的《史籍举要》一书而言，作者对各书内容的介绍不仅仅是简单介绍而已，经常是探流溯源的阐述相关学术内容，常常指出某书在编撰方法上的因革异同，或者其流传过程中的地位变迁情况。例如：此书在论述典制体史书（书中称为“政书”）的代表“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时，对典制体史源源流演变情况有整体的介绍。该书首先指出了“政书”的定义及其名词起源“政书是记述历代王朝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书籍。‘政书’这个名称，目录学上以前无定名，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开始使用的。”进而作者指出，政书的前身是纪传体史籍中的“志”，即“记载这一类材料的史籍，最主要的，二十四史中有‘志’这一类”。至于政书则“是在‘志’以外的一些专讲典章制度的书籍”。随之作者将政书按照类别差异进行了种类划分，介绍说“这些书中像《通典》《文献通考》等是把古今制度联系起来讲的”，即典制体通史“像《唐会要》《五代会要》等是把某一朝制度分类编撰的”，即典制体断代史“像《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等是把当时制定的原文件汇集成册的”，即典制体断代史档案资料汇编“还有专讲某一部分制度的档案书籍，像《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①，即典制体专门史档案资料汇编。关于典制体通史，书中还简要说明了它们的源流演变，即由《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开其端，后乾隆时所修六通——《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六书皆仿《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体例而作”，这九书合称“九通”，然后再“加清末民初刘锦藻所著《续皇朝文献通考》三百二十卷”^②，合称为“十通”，此即为典制

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9页。

② 同上书，第225页。

体通史的简要流变史。关于断代典制体体裁——“会要”，《史籍举要》在介绍《唐会要》《五代会要》的同时，详细分析了它在历朝各代重要书目中的地位变化，“‘会要’一体，今存者自《唐会要》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以《唐会要》入‘类书’类，《直斋书录解題》入‘典故’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入‘故事’类，《宋史·艺文志》入‘类事’类，《四库全书》入‘政书’类”。随后，书中分析了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指出类书“起源甚早，至唐而盛。……皆分门别类，罗列典故，为作文章取材方便而流行”。但是，“《唐会要》则全载典章制度，不同于类书之并载风花雪月、草木虫鱼，故愈至后世，地位愈高，由类书而典故，而故事，而类事，至《四库全书》，竟入‘政书’之列”^①。再如该书在论述《明实录》《清实录》时，进而阐述实录体的源流云：“实录为编年体史书，最早见于记载的有《梁皇帝实录》，记梁武帝事。唐以后每一皇帝死后，嗣君必敕史臣撰修实录，沿为定例。据统计，历代实录共有一百一十六部，但绝大部分已佚。唐代仅存《顺宗实录》，宋代仅存《太宗实录》残本，比较完整的是明清两代的实录。”寥寥数句话，就将实录的沿革存佚情况交代得清楚明白，进一步扩展了读者的知识空间。又如，该书对年谱这类史籍的介绍，亦呈现了寻流溯源的论述特点：作者首先交代年谱兴起的原因“年谱之学多因读名家文集而不知其平生事迹或每多解释不通而兴起。”继而讲解其作法“其作法，自一人之初生以至死亡，每年举出事实。此种材料来源，或属本人事迹，或举其同时人有关事迹，或举当时政治上有何重要变动，然其最主要的材料为本人文集。”然后阐述其源流沿革“年谱始于宋吕大防所撰《杜工部年谱》《韩吏部文公年谱》，大抵创于北宋，至南宋始盛。大防之后如鲁豈《杜工部诗年谱》、赵子栎《杜工部年谱》、胡子《孔子编年》（五卷）、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楼钥《范文正公年谱》、文安礼《柳先生年谱》（一卷）等。至清代，则年谱多至不可胜举。”^②“年谱之学至清代而极盛，大抵皆后人补撰。亦有自撰年谱者，如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杨守敬《邻苏老人自撰年谱》、缪荃孙《艺风老人自撰年谱》。亦有不用年谱之名实则年谱者，

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24页。

② 同上书，第256页。

如汪辉祖《病榻梦痕录》。”^① 仅以数百字就将年谱这种史书体裁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楚明白，还随手征引了多部文献作为例证，作者对文献的熟悉程度，由此再见一斑。再举一例，《史籍举要》在论述《资治通鉴》“因事立论”的学术特点时，首先论及中国“史论”的起源。“古来史书如《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后汉书》有‘论曰’，这是作者因事立论，表示自己对这种事或这个人的看法，有褒有贬，都是想以自己的观点影响读者。”进而，就《资治通鉴》自身而言。“《资治通鉴》的前身《历年图》就有论，《稽古录》也有论，足见论是司马光所重视的事情。《资治通鉴》共有一百八十六篇论，其中分两类，第一类以‘臣光曰’三字发端的，是他自己的议论，共一百零二篇。第二类是历来史家原有的论赞，他认为对的，移作《资治通鉴》的论，这样的论有八十四篇。”“大抵事情善恶很明显的，不需要作论。”“司马光所论述的多是有关治乱之机，即所谓为君之道，事君之道。他是因事进谏，积极为封建政治服务。”^② 此处也不过三百字而已，既阐明了“史论”的源流变化，又论述了《资治通鉴》对这一体例的继承和发展情况。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柴德赓先生治学上善于运用探源溯流、融会贯穿的研究方法。其实，在《史籍举要》中，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是屡见不鲜的。作者往往能够根据自己深厚的文献学功底，特别注意在一般史籍的介绍中瞻前顾后、左右勾连相关史籍文献，处处逢源，为读者把一条条孤立的知识线纵横交汇成一张张丰富生动的文献目录学知识网。《史籍举要》论述中所使用的这种探源溯流、经纬交织的论述方式，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极为渊博的学识。

三 长于历史考据，方法缜密多样

柴德赓在学术研究中，非常善于运用史学考据方法，这也是深受其老师陈垣的影响所致。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序录》中写道：“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陈垣早年服膺乾嘉学派，不仅继承了乾嘉学派优秀的考据学遗产，而且推陈出新，能够将微观

^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57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的史实考索与宏观的历史关照完美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一系列经典的考据学著作，开拓了20世纪考据学的新境界。柴德赓作为陈垣先生的得意弟子，曾在陈垣身边工作达二十年之久，深得陈垣学术之真传。据刘乃和先生回忆，当时师生二人在陈垣励耘书屋谈文论史，经常是边谈论边翻书，甚至为了查找一个证据，还要搬出许多的典籍图书来求证^①。在陈垣先生精心指点下，柴德赓继承了陈垣先生的学术精髓，掌握了陈垣先生的学术方法。刘乃和评价柴德赓说，“他精研目录之学，熟悉史料，所写论文，旁征博引，说理充分，考核精辟，令人信服。对五代史、宋史、清史暨辛亥革命史都有较深研究。尤其对清代学术源流，本末支系，传法师承，了如指掌”^②。刘乃和先生的这个评价可谓知人之言，公允恰当。其中，刘乃和先生评价柴德赓的史学研究具有“旁征博引，说理充分。考核精辟，令人信服”的特点，更是极为准确。早在柴德赓“上大学二年级时，他就撰写了《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论文，考证出明末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几十人事迹，文中充分利用地方志和其他史籍资料，考据详实，被选登在师大《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上”^③。这篇文章，是柴德赓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牛刀小试，初步显示了史学考据的功夫。后来，柴德赓又先后撰写了《宋宦官参与军事考》《〈鮎埼亭集〉谢三宾考》《全谢山与胡稚威》《万斯同之生卒年》等多篇考证性文章，这些文章都已经收录在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史学丛考》一书中。柴德赓在这些文章的考据中，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学术特长，能够娴熟地运用多种史学考据方法进行史学考据工作，其方法之缜密，形式之多样，令人信服。

柴德赓在史学考据方面，有两种考据方法尤为值得一提。其一为竭泽而渔式的考据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柴德赓先生充分运用自己的文献学特长，穷尽搜集并征引某一历史问题的几乎所有史料，然后予以逻辑的学理分析，最后得出恰当合理的结论。比如，柴德赓《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对明季复社同人攻讦阉党余孽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上署名的140余人事迹一一进行了钩稽和考辨，仅该文的上半部分（发表在北平师

① 刘乃和《史学丛考序》，载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首第3页。

② 同上书，卷首第4—5页。

③ 同上书，卷首第2页。

大《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就征引了正史、逸史、别史、方志、家谱、碑传集、文集、诗集、笔记乃至《东林点将录》《复社姓氏》《明清进士题名录》等各种著述近百种之多,如此的旁征博引,几乎将涉及这一问题的所有资料都搜罗殆尽,然后考辨分析,得出了合理的结论。柴德赓的《〈鮑埼亭集〉谢三宾考》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谢三宾的考证,也是采用了竭泽而渔式的考据方法。谢三宾是明末的一个中下级官僚,他曾在明清政权更迭的历史关头三降三叛,是一个进退失据、反复无常,一心只想保住家财和地位,毫无气节可言的宵小之徒。其实,要想钩稽这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并非易事,因为他的地位并不高,《明史》等官修史书对其事迹记载甚少,要想钩稽清晰他的生平事迹难度相当的大。然而,柴德赓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再次展示出雄辩的考据学功夫,他广泛征引了清初实录、明季的野史、文人笔记、地方志、文集、诗集、年谱、日记等各种史料84种之多,这几乎将有关谢三宾的史料钩稽殆尽,然后他又将这些纵横交织、牴牾互见的史料逐次考辨,最终将谢三宾其人的生平概要、降叛事迹、思想活动、师友交游及其子孙后代情况都一一考辨清晰了,此文几乎就是一篇内容丰富、细节清晰的谢三宾传。

其二,是柴德赓还善于采用诗文证史的方法考辨历史事实。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柴德赓的约2万字的长文《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初稿)》^①和一篇2000余字的短文《天堂苏杭说的由来》^②两篇文章中。据统计,前一篇文章直接引用白居易的诗句有70余则,加上韦应物、刘禹锡、陆龟蒙、范仲淹、范成大等人的诗文竟有100余则之多。柴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征引的诗文资料,主要归纳为11种类型,包括考史事之时间、考人物之交游、考史志之阙漏、考苏州州境大小与户口数字、考苏州城的规模与繁荣程度、考苏州物产之繁盛、记苏州城多水多桥、记苏州偶发的自然灾害、记杭州之盛兼夸苏杭二州、反映下层民众之境况等问题的资料^③。柴德赓将这些诗文有机运用于文章论题的考证中,同时还广泛地征引正史、方志、文集等资料,使得所有材料形成纵横交织,上下贯穿的结构体系,缜密地论证出唐代苏州各个方面的繁荣状况,包括社会

① 载《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与第2期。

② 载《新华日报》1961年6月11日“新华副刊”。

③ 邱敏《以诗证史——从一篇短文论柴德赓的治学风格》,载《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安定、经济富庶、城市繁华、市场活跃、户口繁多等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证，而且这些论证基本都以唐代的诗文作为佐证。《天堂苏杭说的由来》一文虽仅有2000余字，却引用白居易诗文有8则之多，还引用了苏轼、苏辙等诗文8则，条分缕析地论证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的由来与演变，说理透彻，解析精辟，让人兴味盎然。

回顾柴德赓一生的治学经历，其注重“诗文证史”并不仅限于上述两篇文章，只要随意地翻阅《史学丛考》这部论文集，就会发现几乎每一篇文章中都有以诗文证史的现象。比如《〈鮚埼亭集〉谢三宾考》中，就大量地引用了《续甬上耆旧诗》《鮚埼亭诗集》《句余土音补注》《深省堂诗集》《郑寒村诗文集》《明事杂咏》《松园浪淘集》等诗文，详细考证了谢三宾这个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相关史实，深化了我们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认识。因而，善于使用诗文证史的方式考辨史事确实是柴德赓的一个重要学术风格。

四 谙熟历史比较方法，常从比较中获得新意

一般而言，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所研究的历史现象进行时间系列上的前后阶段的纵向异同比较（又称历时性比较或垂直比较）；二是对所研究的历史现象作空间系列上的同一阶段的横向异同比较（又称共时性比较或水平比较）。有人认为，这种史学比较方法是20世纪初期左右才从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然后逐渐传入中国的。或许作为一种现代史学方法的自觉运用，比较史学方法也许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其实，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史学，其起源应该是非常早的，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少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例子。

柴德赓先生亦是熟练应用比较方法研究史学的典范。或许我们根本不用多加论述，仅仅从柴德赓的论文题目中便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例如，《全谢山与胡稚威》《王西庄与钱竹汀》《章实斋与汪荣甫》以及《〈鮚埼亭集〉谢三宾考》卷五《谢三宾与钱谦益》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历史人物，都是两两一对同时出现，其中所蕴含的比较意味是不言自明的。上述这些人物，基本都是同类人物之间的比较。

有关同类人物的比较，我们可以《王西庄与钱竹汀》一文进行例证。

该文主要是论述乾嘉考据学者王鸣盛与钱大昕的学术异同，对二者学术研究的旨趣、内容和理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文章开篇即指出：乾嘉史学三大家的治学途径和方法是有一定差异的，甚至是不小的差异，其中“王（鸣盛）、钱（大昕）是一个路子，赵（翼）又是一个路子”^①。即是说，柴德赓认为王鸣盛和钱大昕的治学途径比较相似，而赵翼的治学途径相对独树一帜。柴德赓的这一看法获得了当代学者黄爱平、杜维运、乔治忠的支持。黄爱平说“乾嘉时期，大多数史学家如王鸣盛、钱大昕等人都由经入史，用治经的方法治史。赵翼则与此有别，而是由文入史，在经学方面无所建树。”^②因为赵翼生性颖悟，才华横溢，早年喜好古文诗词，颇“泛滥于汉、魏、唐、宋诗古文词家，兼习为词曲”，直至晚年归田以后才将精力集中于史学研究上，先后著成《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等史学研究著作。杜维运和乔治忠则指出了赵翼和王鸣盛、钱大昕的治学方法的不同，杜维运认为赵翼实际上是一位“立于乾嘉学风之外的史学家”^③，不能将其和钱大昕、王鸣盛一样并列为乾嘉历史考据家。乔治忠也说：乾嘉史家并非全部擅长考据，“有的则不大善于从事历史考据，这构成史学另一侧面的风景线，赵翼和章学诚是其中的两位典型人物”^④。由此可见，柴德赓的看法与不少当代学者看法相似，他们均认为赵翼与王鸣盛和钱大昕治学途辙多有不同。揆诸事实，基本如此。然而，不同于赵翼的是，王鸣盛和钱大昕的治学途径非常相似，他们都擅长学术考据，还是“同乡、同学、同年、同官，又是至亲，晚年又同住苏州”，而且还“各人做了一部内容大致相同的书”^⑤，二人在学术研究取径上确实有较多的相似点。然而，柴德赓却同中见异地指出，王、钱二氏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不小的差异。首先，二者学术研究的内容不同。王鸣盛治学，“前期偏重经学，后期转入史学。就他的著述来看，经史参半”^⑥，经史考证都有出色成就，但是“当时人重视他的仍在经学”^⑦，即认为他的经学优于史学。然而，钱

① 柴德赓 《王西庄与钱竹汀》，载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5页。

② 黄爱平 《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③ 杜维运 《中国史学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07页。

④ 乔治忠 《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

⑤ 指的是王鸣盛所著《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二书均为考察讨论历代正史内容、体例、书法的考证性著作。

⑥ 柴德赓 《王西庄与钱竹汀》，载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0页。

⑦ 同上书，第261页。

大昕的学问“主要是史学，其余各种专门知识，兼收并蓄，都是为史学服务的”^①。他“以治经的方法治史”，却又“专治史而不专治一经”，他的为学次序是“以治史为主导的”，因而“当时人对竹汀的评价全在史学”^②，在其生前就早被大家公认为专门史学家了。其次，二者学术功力不同。钱大昕不仅史学著作较王鸣盛多，“专精亦过之”，主要原因是“他把治经的功夫移来治史”。具体而言，柴德赓认为“竹汀于宋辽金元四史，用功较深，元史尤为专门。这方面是西庄所力所未及的。竹汀精于算学，对古代历法极有心得，著《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等，这是西庄未曾致力，引以为憾的。文字音韵之学，竹汀和西庄都用过功，但竹汀对古无轻唇音等比西庄有所发明。此外，地理、官制、金石、目录之学，两人各有专门，诗文亦工力悉敌。”^③其三，二者著书的体例和方法也有所不同。从形式上看，“西庄的校勘每一条都有个题目使读者便于检寻”。“竹汀依诸史次序，标某纪某传，不立题目，有的一篇之中校出好些条，也有多少篇连着一起没有校记的。”从内容上，“西庄《十七史商榷》有三种内容是《廿二史考异》所没有”，即“评论史书优劣”“评论历史人物”和“阐述治学方法”三种^④。其四，二者治学态度和学术影响不同。柴德赓指出，王、钱二人总体说来的治学态度都是非常认真的，但是“西庄骄傲，看不起人，时时形之笔墨。竹汀则谦虚谨慎”^⑤。就学术影响来看，二者的著述传世，都是可以卓然自立的，但是，“从经学的考据转到史学的考据，竹汀关系最大，考证最精，其影响也最深远”^⑥。所有这些结论，都是柴德赓通过详细的比较分析考察而得出的，读来令人信服。

在柴德赓的研究中，除了有对同类人物史事的比较外，还有不少正反对比十分强烈的史事与人物的比较研究，以此达到区分善恶、泾渭分明的目的。《〈鮚埼亭集〉谢三宾考》对谢三宾历史事迹的考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谢三宾为明末降臣，字象三，浙江鄞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时官至太仆寺少卿。清兵南下，很多江南士大夫坚执民族气节，奋起抗

① 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载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2页。

② 同上书，第263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267页。

⑤ 同上书，第269页。

⑥ 同上书，第265页。

清，不与清朝合作。然而，谢三宾却是个丧失民族气节的小人，他屡次降清，还屡次设计陷害江南抗清义士。而且，由于他叛服无常，徘徊于明清之间，致使很多当时记载明清之际历史的史籍对其记载隐晦不清，甚至名字异称都多达20余种。柴德赓先生本着“诛奸谀于既死”，曝其原形而垂戒后世的目的，决定“钩稽其事迹著于篇”^①，写成《〈鮚埼亭集〉谢三宾考》一文。该文详尽考证了谢三宾的一生行事，并举证了丰富的事例揭露了谢三宾的贪生怕死、陷害忠义的事实，从而凸显了抗清义士的高尚人格和节操。事例之一——亲往杭州归降：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至浙江，召各地明朝官绅来降。谢三宾立即前往杭州谒见清军统帅，表示归顺。然而与之“往还甚密”的同县友人祁彪佳则拒绝前往谒见，自投池中，以死殉节。谢三宾与祁彪佳，一个是贪生怕死、丧失气节；一个则是大义凛然、以死殉节，二者行事风格之对比何其鲜明。他们二者也成为明清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两种取向的代表，为我们了解明清之际的历史提供了绝佳的参考坐标。事例之二——试图诱杀抗清志士，破坏“六狂生起义”。当时鄞县士子董志宁、王家勤等所谓“六狂生”倡议起兵抗清，众推公绅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首，并请驻定海总兵王之仁带兵来会，但谢三宾也派人致书王之仁，想以千金为饵劝诱王之仁杀六狂生与钱肃乐，然而王之仁不为所动，计划流产。事例之三——贿取南明高位后再次降清。鲁王朱以海在浙东建立抗清政权后，谢三宾见有机可乘，竟然以投机的行贿手段获得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辅臣高位，然而不久义师失败，鲁王入海，谢三宾遂迫不及待率朝中大臣八十余人再次降清。然而与此同时，曾与谢三宾一同讨伐登、莱叛军而立功的朱大典，却“破家举义，尽其财不私”，立守金华，终因力竭不支而焚死眷属十七口后自尽殉国。上述三个对比鲜明的事例，一方面揭示出了谢三宾的投降卖国的丑行；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抗清义士的凛然正气。由此可见，柴德赓对比分析方法的运用，不仅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也使读者印象深刻，让人赞叹不已。

综上所述，柴德赓先生精通目录学和文献学，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扎实的文献考辨基础之上的。他治史擅长历史考据、旁征博引，善

^① 柴德赓 《〈鮚埼亭集〉谢三宾考》卷一《谢三宾略传及异称》，载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页。

于缜密分析纷繁复杂的史料，从中洞见幽微，并归于实事求是，获得真实的历史见解。他还善于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经常能从平实的比较中获得新意，推动史学研究的进步。因此，柴德赓先生不愧为 20 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治史方法精当，特点鲜明，成果卓越，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